



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

李维琦 黎千驹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

李维琦 黎千驹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 /李维琦,黎千驹著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ISBN 7 - 81081 - 375 - 7

I . 现 … II . ①李 … ②黎 … III . 汉语—修辞学—现代—研究 IV .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824 号

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

李维琦 黎千驹 著

◇责任编辑:黄 林 唐志成

◇责任校对:胡晓军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8872636

网址/www.hunnu.edu.cn/press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60 千字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400 册

◇书号:ISBN 7 - 81081 - 375 - 7/H·024

◇定价:22.00 元

序 一

有人把科学的研究比做攀登高峰，有人把它比做钻探矿藏：我以为都是好的修辞，是贴切、生动的比喻。李维琦教授的修辞研究历程，就是这样的。

20世纪80年代初，维琦把从国外引进的“同义结构”（同义形式、同义手段）这个理论作了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考察，并且作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但他没有空谈一顿，就此止步，他把它应用于实际，使这理论中国化和具体化了。

首先在他的古汉语《修辞学》（1984年）中把同义修辞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加以论列，这是中国修辞学界第一次把这个理论应用于古汉语修辞研究，令人耳目一新，被认为是“古汉语修辞研究的一项进展”。

维琦一不做二不休。不久之后，又邀约几位教授，合著了一本《古汉语同义修辞》（1989年），搜罗文史古籍的书证，爬梳剔抉，排列了一个系统。洋洋数十万言，理论和实际结合，把同义手段这个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

跨入新世纪，维琦虽然年届古稀，但仍不知老之将至，天天自强不息，在潜心研究佛经词语之余，还没有放弃他的夙愿，即把同义修辞理论应用于现代汉语的研究。现在在我面前赫然摆着一本《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打印稿，就是他和千驹同志合作的成果。我略翻阅了一下，真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我惊异于他的研究不是越来越深奥佶屈，而是越来越平易实用，深入浅出了。

我很为他的新成果而高兴。我佩服他温故知新、与时俱进的精神。这里可照应到开头那两句话了。他在研究的道路上，又攀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又把矿井挖得更深了，而且掘得了很丰富的矿藏。总之，维琦在中国修辞学这门学科中做出了新的贡献。

我特把这个信息传播给大家，愿与大家分享他的成果。

秦旭卿
2003年3月5日·广州

序 二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事物更新之快超乎常例。对时代具有无限适应潜能的汉语，也显得面目一新了。曾几何时，我这个几十年来一直在学汉语的人真感到跟不上语言发展的步伐了。但心情又特别地兴奋，因为全社会对语言的学习和运用都空前地重视了。自从封闭状态被打破，人们都大大扩展了活动空间，即便是从来少见世面的人，也纷纷走南闯北，他们走出去后第一要务便是学习语言，学会交际。具有各种身份，驰骋于社会大潮中、活跃在公众面前的人，就更注重自己的语言素养了，因为这比时尚衣冠更能影响公众的认可程度。文明环境的建设，素质教育的推行，语言规范、语言美成为理所当然的内容。众多的传播媒体，各种直接服务于大众的事业，已把提高语言质量、增强语言效果同他们的事业宗旨甚至事业前途联系起来，并且有了许多令人满意的实际表现。仅据这些就可以看出，提高使用语言的能力，增强语言表达效果，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追求。这种局面，是我们的语言学家、修辞学家最乐于看到的，也最乐于为之贡献自己的所长。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专家们做出的贡献确实是惊人的。单说修辞专著出版情况吧，从建国到上世纪末出版的此类专著中，就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作（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至于对研究领域的拓展，对原有认识的深化，更是至足称道的。真感谢我们的学者专家们，更感谢我们的新时代！如同许多大大发展了的事业还有种种问题一样，

取得了惊人成绩的汉语修辞学也有它的不足。如果说让我，这不足首先就是对现在为数最多的读者群最基本的需要重视不够，适用于他们的修辞指导书实在太少。

值得高兴的是，新世纪才开始，我们就有了一部切合广大读者需要的新书——《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这是一部很有特色、很值得读的书。我这里主要说说它的实践性、适用性。

本书取材全在一般读者熟悉的范围内，即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现代白话文。这些文章，出自从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师直到与我们同在的名家名人之手，典范性很强。从思想到文辞都对读过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一部分篇章不止影响一代人。现在就这些文章的修辞问题跟读过的人讨论，自然比写书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找来的材料更受读者欢迎，因为易懂易跟进。

用动态追溯的方法引导读者去接触作者或教材编者的修辞操作。常见的修辞著作总是引出一句或一个片段来讲它怎么怎么精彩，这种做法是静态的描写。静态的描写可以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了解修辞手段的丰富性和方法的多样性，是不可缺少的。但如何帮助读者由欣赏者进而成为实践者，是一个需要学者专家用力突破的难题。本书作者苦心独具，整部书都是文章曾经修改过的地方改前改后的对照，有对照就好比较；有了比较，才可以明白原作者或教材编者选定某种说法的缘由。平时觉得只可意会的东西，现在可以言传，这就让读者进一步体察到修辞的一些“奥秘”了。

用同义修辞学说贯穿全书。全书既以实例的解析为主体，而实例是五花八门的，解析就非有一个共通的理论做依据不可。本书用同义学说一以贯之，这又是一个大创新。同义

学说是应该让读者掌握的，但在书里是理论为实例解析服务，而不是实例为理论做注脚。形式上也分章分节，但这是对众多实例进行分析、归纳而得的大块小块，并不是理论的大纲细目。这样读者不会为一套一套的术语、一串一串的定义所困扰，你看明白了书中修辞实例的解析，也就知道了同义学说在修辞实践中的用处；还会发现自己并不是跟同义修辞无缘的，因而更有学习、运用同义学说的自觉性。

还应特别提到的一点是本书对消极修辞高度重视。把修辞现象分为消极修辞、积极修辞两类，是早已为修辞学界所接受的，这样分类无可非议。但我们读到的许多修辞著作，总不肯给消极修辞以应有的地位，有的书干脆把这类排除在外，这就太可惜了。为什么会这样做？大概因为消极修辞“广泛语辞的全部”“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或者说“基本的修辞法”（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就认为它的重要性远不及积极修辞吧。本书却突出地讲消极修辞问题。这不是作者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基于两方面的事实：一是实际材料就是此类居多，不能避而不谈；二是广大修辞学习者最需帮助的就是此类，不可置之不顾。从本书中所收实例可以看到，连大文豪鲁迅对自己的文辞所作修改也多属此类。比如《说“面子”》：“在上海，‘吃外国火腿’虽然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手稿上没有“本国的”这个限制成分。粗略地看，前面已出现了“在上海”，那么这个“本国的”不加也应能看明白。细心地想，则加了这个成分后，多了一层言外之意：倘若是下等人，到了上海那也是上等人了（见本书 239 页）。按分类标准，这增添句子成分之举，是消极修辞，但谁能说这是无可无不可

的？文学巨匠叶圣陶，在将他的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编入文集时，也作了若干修改。如选集中的《潘先生在难中》：“最难堪的，自然是妻儿远离，而且不通消息，而且有永远难通的朕兆。”在文集里，“不通消息”改为“消息不通”了。这不过是让“消息”由充当宾语改为充当主语而已，够“消极”了。但改与不改大有关系：“不通消息”有可能被理解为妻子连信也没写一封，再连着下句想，只怕要发生家庭危机了；实际上当时是处于战乱中，家庭离散是战乱所致。“消息不通”（更不用说人的往来了），就更突出了战争的祸害（见本书第75页）。怎么能说消极修辞无关紧要呢？中学教材编者可能比作者本人更容易发现应改的地方，本书所收的例子中，由编者改动的最多，而且基本上是“消极”的一类。如陶斯亮《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可是，在您病中，我却没能给您喂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编者把“没能”改为“不能”（相应地删去两个“过”字）。这点小小改动，编者肯定也是经过反复斟酌才下笔的。“没能”，可以想像为自己事多没来得及甚至是疏忽了怎么的，因而连最简单的事都没做过；“不能”则显出非不为也，势不能也。照常理，作为女儿，又是医生，可以给重病的父亲做的事是很多的，可是连喂药、打针的事都不能做一次。读到这里，大可问个为什么。为什么呢？答案在“不能”二字的背后（见本书第18页）。编者做的功夫也是消极修辞，可从效果来看，它的价值一点也不低。既然有影响的作者以至文学大师都把消极修辞看得非常重要，那么能说一般的学习者、写作者反而不需要下功夫了吗？正好相反，他们最需要加强这类“普遍使用的”“基本的”修辞的学习。我不想到中学生的作文本上找例子来说明，倒是要用层次高些的作者笔下的例子。我手头就有一

篇登载在报纸副刊突出位置的文章，是为一位研究汉字的农
民叫屈的。看得出来，作者并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文章有
多处读不大明白。比如：“他宣称，700个组字符号日后将被
证明能够解开中华文明数千年文字的不解之谜。”“如果说他
现在有点狂的话，也只是对‘怀才不遇’的不满。”另有一篇，作
者是某研究所成员，文首就有这样的话：“本文对××××作
全面概述，为有志于此者抛砖引玉。”我引这样的例子，是有感
于缺乏“基本的”训练或训练不扎实留下的后遗症太难治。像
这两个作者，笔下功夫没有达到明确、通顺等基本要求就走向
社会了，也许他们写的东西已不少，别人看得出他们的缺陷，
但没有人为他们指点这些了，于是就这样毫不自察地我行我
素。修辞学者对这种现象一定不会漠视，问题是如何下功夫
来帮助所有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一代。
因此，本书这种以包括中学生在内的般读者为对象，以“普
遍使用的”“基本的”修辞法为重点的做法，就显得十分可贵
了。

本书作者之一的李维琦教授，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成就的
语言学家。单说修辞学研究成果，就早有《修辞学》《古汉语同
义修辞》问世，学术界均有佳评，无须引述。虽然他多年的修
辞研究都是古汉语方面的，但用心于现代汉语修辞，早在古汉
语修辞研究之前。在古汉语修辞研究接连出成果之后，他郑
重宣言：“研究古汉语修辞是我们的起点，落脚点还是在现代
汉语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此前十几年间做的古汉语修
辞研究，都是当作现代汉语修辞研究的前期工作来做的。一
则观今宜鉴古，古汉语丰富无比的修辞材料未曾广泛涉猎，深
入研究，就不敢说能很容易地观透与之一脉相承的现代汉语

修辞。二则自己虽已认定同义学说适用于汉语修辞,但不曾反复应用,就没有把握为它准确地定位而充分发挥其应用价值。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在方法以至方向上有如此勇敢的突破,对多至七百数十而来源、背景各不一样的实例能一一解析得如此明白透辟,运用同义学说于涉及各种语言要素以及超出语言要素的修辞现象又能左右逢源,无往不利,就在于它是作者蓄之久、积之深、验之反复的产物。真为我们的读者能得到这样的好书而高兴。读者有了此书,跟着它走,就走上学习修辞的康庄大道了。

我步维琦教授后尘多年,但早已是落伍者。时序推移至今,差距更不可以道里计了。都说岁月不饶人,我便以此自宽。但一看维琦,他依然体力不衰,毅力不减,识力不迟,笔力不拙,我钦敬有加,愧悔无已。近年来,我不轻易去打扰他。今年早些时候相聚,被告知他这部新著即将脱稿。我表示希望获得先睹之快,没想到他竟命我读后写上几句。我浅薄如此,怎敢对他的大著置喙?但又很高兴有此机会来表示对汉语修辞康庄大道得以开辟的祝贺,对汉语修辞灿烂前景的期待,以及对维琦教授这个落脚点不断延伸扩展的祝愿。

王玉堂
2002年秋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绪论.....	(1)
第一章 同义词语的斟酌.....	(5)
第一节 准确.....	(6)
第二节 明白	(19)
第三节 贴切	(29)
第二章 精确与模糊的抉择	(41)
第一节 通说	(41)
第二节 数量模糊	(44)
第三节 时间模糊	(55)
第四节 程度模糊及其他	(58)
第三章 同义结构的比量	(70)
第一节 同义成分	(70)
第二节 常位与变位	(87)
第三节 语序的移动	(94)
第四章 同义句式的挑选	(106)
第一节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的挑选	(106)
第二节 肯定句、否定句,主动句、被动句的挑选	

.....	(110)
第三节 特殊句式的挑选	(116)
第四节 单句与复句的挑选	(123)
第五节 分句次序的移动	(128)
第五章 广义借代的运用	(134)
第一节 广义借代的由来	(134)
第二节 客观相代	(140)
第三节 主观相代	(162)
第六章 繁简的权衡	(196)
第一节 省略与否(一)	(196)
第二节 省略与否(二)	(226)
第三节 重复与否	(241)
第七章 信息的取舍	(254)
第一节 信息不同,各有侧重	(255)
第二节 看似不同,实则相同	(258)
第三节 信息的增删	(263)
第八章 语音形式的讲究	(282)
第一节 音韵	(282)
第二节 音节	(285)
第三节 音步及其他	(297)
引用书目	(306)
后记	(311)

绪 论

我们在《古汉语同义修辞》^①里说过：“我们现在毫不怀疑同义修辞的实践意义，但如果仅仅局限在古汉语范围内，就不能使广大的读者群，包括我们的中学生在内，从我们研究成果中获得什么。必须把我们这一套构想运用到现代汉语里去。现代汉语学科中语音、词汇、语法等，主要是说明汉语，而我们的修辞则是专讲使用汉语。在一定意义上说，使用比说明更为重要。我甚至设想大学里总有一天会把修辞学列为必修课程，其地位不在现在的现代汉语课之下。中学语文课的辞格修辞的内容，或许会让位给同义修辞。研究古代汉语修辞是我们的起点，落脚点还是在现代汉语方面。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现在这本《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就是“我们将为此而努力”的一个成果，是我们把同义修辞的一套构想，运用到现代汉语里面来的一个尝试。同义学说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热起来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出版了两本书^②，由于做了一些比较扎实的工作，多少引起了一些反响。例如南京大学的王希杰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与我的学长秦旭卿共同写了评介文章。后来在他的著作里至少两次提到我们的研

①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

② 一本是《古汉语同义修辞》，另一本是古汉语的《修辞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究，认为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有那么一点打抱不平的意思。而我们自己，则是毁誉由人，并未在意。话虽如此说，对于批评，我们还是会充分注意的。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听到什么批评意见。我心里明白，修辞学者都在忙自己研究，无意就个别人的研究进行公开的批评，而只是冷落遇之。这是比批评更厉害的一着。好在一些年轻人，并没有那么多的忌讳，他们在一次修辞学年会上问过我：“你那个同义修辞怎么能包括一切修辞呢？”想把同义修辞涵盖一切修辞内容，那不是我的观点，我从来只是说同义修辞是修辞的一部分，决没有用它来“吞并”别的修辞的意思，例如辞格修辞，同义修辞是决然不能替代的。我们现在想明确地把我们所说的同义修辞定位为实践修辞，它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多用实例说明，而且也重在实践，希望对实践有些好处。理论非我所长，就多讲实际，即使我说得不对，也还有材料在。让理论方面在行的人去提炼理论吧。这样，比在理论方面瞎说一通要强。就是说，总多少给人一点东西，写了没有白写。好，就这样定了，叫做“实践修辞”。

“实践修辞”的内容是怎么定的呢？我们还是如同搞古汉语同义修辞那样，去找可资比较的材料。这种材料的一个广大的来源，是中学语文教材。教材的课文大多出自名家的手笔。教材编者在选用的时候，往往要作一些修订。这样的修订，在我们看来，就是修辞。有的修订后便好一些了，也有相反的情形，不修订还好些。这后一种情形，原文对于修订的文字来说，也是修辞。或许他写作的时候，也曾考虑过可否采用与修订者相同的意见。有一段时间，时兴提供一些名家修改文章的范例，这一类的修改得好的例子，也就是修辞的范例。还有若干作家自己改自己文章的记录，其中包括从草稿到定

稿，从散集到全集，从早先出版的一本集子，到后来的另外一个集子，这里面都有我们用得上的比较材料。出版家们有时需要出一些总集，如“现代中国散文选”之类，进这种总集的文章，有一些与原文有出入，这出入之处，也是我们很看重的。我们搜集的材料大致就是这些。把所有这些材料拿来比较，原文是怎样的，改文是怎样的，看二者之间有何不同，有何联系和关系。把这个“何”分门别类，形成框架，把材料“填”进这个框架里去，尽其所能作些分析，就是我们这本“实践修辞”的内容了。

定出来的内容分为八个部分，写出八章来。一、二章是关于词汇的。一章讲同义词，这是任何一本修辞书都要谈的，不过我们谈得宽一点，不限于语法书中所说的同义词。二章讲模糊学说在修辞中的运用，实在也可归入我们所说的同义词范围，因为分量较大，就独立出来成为一章。第三章同义结构，第四章同义句式。两章都属于语法修辞。三章是我们的创获，颇有新意。四章是大家都说的，只是我们有较多的对比材料而已。第八章的内容是讲究语音形式。一共五章，是语言要素方面的修辞。第六章以繁简为论述内容。日常写作，都会自觉不自觉碰到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文字工夫，或者说是一种写作素养。在我们研究修辞现象时，除了上述六大部分之外，还有个信息采择的问题，或多或少，或有或无，或此或彼，我们把这也纳入了修辞轨道。我们坚信，讨论这个问题，对于写作实践，是很有益的。不在上面所说的范围里面的，有一种很重要的现象，原文与改文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关系，这种联系或关系，有些是主观的，有些是客观的。套用现成的说法，这种现象我们叫做“借代”，但含义比陈望道先生所说

“借代”要宽泛得多，所以叫它做“广义借代”。这“广义借代”的发明权只能属于我们，遗憾的是它还没有得到社会公认。但我们认为总有一天，这个“广义借代”会被接纳入学术殿堂，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总括地说，“实践修辞”就这样四个部分，语言要素修辞为主体，加上文字工夫、信息采择和广义借代。为什么是这四大部分，而不是三大部分？因为我们研究修辞现象，经过对比、分析、归纳，所得出的就是四个部分。将来研究深入，或者会增加到五个部分，六个部分。而现在就只这四部分，我们就如实地写四个部分。

读者已经看到，我们关于同义修辞的表述和论断，在我们的论文和几本著作里，前后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这里反映了认识的不断深化；有时不是深化，而是举棋不定，也与手头的材料的方面有密切关系。这里的说法乃至框架，都有待完善。至于具体的分析，就更难保证其一定正确。就学术研究来说，我们的近期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发现同义修辞手段，运用这些手段的原则和方法等的研究，暂时还不能花很多精力去做。